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 10.15986/j.1008-7192.2017.03.001

# 劳动经济学视阈下“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探微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中国模式”最早滥觞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劳动经济学是理解“中国模式”的一把钥匙。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特色“中国模式”受到世人的瞩目。而继续保持“中国模式”的强劲动力,必须继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并使之最大化,还要改革户籍制度、择机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的制度环境是“中国模式”能否可持续的关键。

**关键词:**中国模式;可持续性;劳动经济学;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D 619; F 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3-000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出现了“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谜”,在国际上形成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日渐式微的“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模式”正在受到世人的青睐,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可持续性的讨论也随之而来。如何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联及因果关系,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田春生认为中国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而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内生性制度安排”,既是“中国模式”的显著特点,更是“中国模式”实践与理论创新点所在<sup>[1]</sup>。姚洋认为我们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且转型的速度与转型质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sup>[2]</sup>。郑京平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究了中国奇迹的原因,提出体制转轨、经济全球化后发展、人口结构和县级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等五大红利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sup>[3]</sup>。国外方面,狄忠蒲(Bruce Dickson)认为高速经济发展需要以增长为目标的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

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sup>[4]</sup>。我们以为,上述论点尚不能解释“中国模式”的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路径以及“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

## 一、观察“中国模式”的一个新的视角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以及“中国模式”的形成皆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有关,根据雷默的观点,“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助推器。中国改革遵循的是倒逼机制,改革与创新的结果可以说是提出问题的结果,也是解决问题的结果<sup>[5]7-9</sup>。中国根据自身国情提出渐进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不断地释放出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生产力要素。体制转轨过程使各种生产要素从不利于发挥传统体制向有利于发挥新体制作用的转换,通过重新分配组合使得在传统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潜能被激发出来。

当前,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多,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红利

收稿日期:2017-03-15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模式’话语建构研究”(SK2017A0659);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应用研究项目院内招标课题(2017ZDH06)

作者简介:陶绍兴(1976-),男,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mail:taoshaoxing8237@sina.com

正在消失的国家(图1),不能忽视这些掣肘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人口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实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型(表1)。通过表1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抚养系数也在不断下降。这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都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也提出了巨大

的挑战。“中国模式”可以持续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从经济学的、文化的、还有历史的等多维度来进行。本文主要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下,这是本文分析“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出发点和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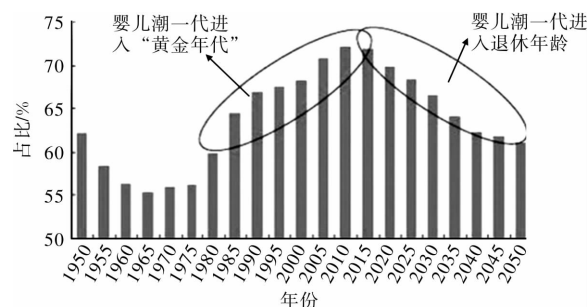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

表1 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抚养系数

时间段(年度)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90	1990 - 2000	1960 - 2000	1989 - 2006
GDP 增长率(%)	2.7	6.3	9.4	10.1	7.8	9.6
抚养系数(%)	79.2	75.3	56.9	53.3	65.0	45.8

## 二、分析“中国模式”的劳动经济学框架

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如何实现有效配置的学科。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研究“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如何配置的学科。其直接研究对象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兼顾运行分析以及劳动力的福利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同样也可以由劳动经济学进行分析,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就业和工资等都是通过计划而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劳动力的供给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不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简而言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的完全是另一种协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方式。这一系列的扭曲劳动力宏观经济政策是为推行赶超战略而实施的。

总之,“中国模式”最早滥觞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内生于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释放,使比较优势可以顺利得以发挥。这些都可以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进

行理解。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模式”是内生性的,而非移植性的。

### 1. 农村改革促使劳动力要素得以释放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社会和劳动力的一些特征,使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成为可能。农村改革的历史根源和两个相关联的因素密切相关,人民公社制,一方面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激励,另一方面为政府严格控制个人的选择空间。所以,农村改革以前劳动力被浪费,主要源于未将劳动力要素释放出来。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再次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将土地的经营权归农民所有,重新确立了农民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并且实行了“联产计酬”的分配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大批富余劳动力走到非农产业,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动能。2016年10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将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农业改

革为“中国奇迹”贡献巨大。

## 2. 大量劳动力的转移

李培林估算中国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了20%。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把农村从事低端农业劳动的人口带到企业里面做技术工人,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sup>[6]</sup>。而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越来越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既能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快城市化,又能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 3. 人口结构的转变

人口结构的转变为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与此相伴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结构的典型特点是“三低一高”的人口结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劳动力人口比重高。这种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中国是典型的高储蓄国家,在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利好之下,中国成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据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正是“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奇迹,从1982年到2000年的近二十年内,由于总抚养比持续下降,使得人均GDP增速快速上升,为同期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陆旸通过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发现如果在“十三五”初期各项改革发挥作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产税减少20%、劳动参与率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2个百分点、增加培训),那么综合“改革红利”将达到平均1~2个百分点<sup>[7]</sup>。

## 4. 符合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表现活跃,其形成的产业价值链呈迅猛扩张之势。正是我国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尽管是在这种价值链的低端,但是由于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使得我国外贸进出口从总额上呈井喷式增长。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0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利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三、有挑战,更是机遇:“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展望

我们用辩证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既可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实践的梳理和总结,也可以说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思设计。然而,当前却存在把“中国模式”静态化的倾向,认为与其他很多国家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经济奇迹和繁荣,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制度表现出的相当高的应对能力,无论在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应付危机所使用的方式方面。而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这证明“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已经陶醉其中而不可自拔,缺乏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也有学者理性指出,应当自警自检,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sup>[8]</sup>。

自1999年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呈加速发展之势,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呈高发态势。我国人口红利可能耗竭,每个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时代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有数据显示,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如果我们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践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工的理念,中国将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认为,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实质性增长,这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王国。同时,中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正在逐步消失,只靠需求侧进行拉动的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供给侧方面的技术效率提高有限,资本效率不高,人力资本的提升有限<sup>[9]</sup>。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寻找新的动能,进而保持“中国模式”的强劲动力。首先,必须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在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确保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同

时,因地制宜,实行地区差异化政策,构建东西部产业级差梯度。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项目确立自身的后发优势。这样,由于对劳动力需求较多,且劳动力层次不高,可以靠农村不断释放出的劳动力来维持人口红利。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红利具有劳动、技术、资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故只有挖掘内涵式的人口红利,取长补短,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向集约型发展战略,向中高端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迈进。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还会导致人口构成方面的积极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产生部分主动受教育的需求。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是人口红利后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发展点之所系,亦称第二次人口红利。其次,新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十八大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为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增收提高较为缓慢,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性来源不平衡,农民增收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后劲依然不足,城乡收入不平等渐趋扩大,这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对广大农民而言,只有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才能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扩大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性来源,提高农民增收和降低农户收入不平等。在双重转型背景下,土地确权能够使得中国经济由第一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二类非均衡,这样农村经济活力的提升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城归”,也即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进行创业和创新,农村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出现使得新人口红利逐步形成。这样虽然国外所说的红利已经消失,但是新人口红利已经形成,这将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增长<sup>[10]</sup>。

#### 四、结 论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奇迹,这种增长遵循了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和持续创新。但现在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而且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现实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现实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必然处于动态发展中。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及其劳动力特征的获取是有条件的,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人口结构所带来的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

高质量的制度环境是“中国模式”能否可持续的关键,制度环境又是由政府设计的。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政府始终看作是问题本身的来源,政府也是解决问题的来源。“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不可能“去政治化”的。政府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止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新红利,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果断拆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积极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而取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好的制度,使得社会有一个完善和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机制,以及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我们应该择机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制定能够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

#### 参 考 文 献

- [1] 田春生. 理解“中国模式”的制度视角[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5): 15-18.
- [2] 姚洋. 中国模式与“中性政府”[N]. 北京日报, 2008-10-16.
- [3] 郑京平. 中国经济奇迹之源: 开放的市场经济——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J]. 中国发展观察, 2008(10): 4-7.
- [4] 狄忠蒲. 谁对“北京共识”满意?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EB/OL]. [2009-07-07].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774-4.html>.
- [5] 雷默. 北京共识[M]//崔之元. 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6] 李培林. 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1): 53-62.
- [7] 陆旸.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J]. 中国金融, 2016(20): 40-42.
- [8] 吴江. 中国模式被热议当自警, 不可自夸“盛世”[J]. 共产党员, 2009(3)(下): 17.
- [9] 马述忠, 王笑笑, 张洪胜. 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否缓解人口红利下降的压力[J]. 世界经济, 2016(7): 121-143.
- [10] 厉以宁. 中国正出现“城归”人口红利并未枯竭[EB/OL]. [2016-12-10]. <http://www.v866.com/15c9nec620161210c6n475479919.shtml>.

(下转第36页)

## A Discussion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Innovat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Public Domain of Knowledge

*QING Zhi-qio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property right set up for the knowledge of public goods. It can motiva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as well the knowledge exchange mechanism.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centive and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the sole relational schema, nor the optimal one. Other items such as prize, priority or contract of research are closely relevant to particular certain condition of constraints. The public domain of knowledge is a par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key element to advance the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and reform the present structure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for the booming of public domain of knowledge.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public domain

【编辑 高婉炯】

=====

(上接第4页)

## An Explor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Economics

*TAO Shao-x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Having originated from the miracl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ina model” is defined by the labor economics. “China model” with Chines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bor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ttracts much mor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trong power, we should keep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of, and make the full use of the maximized demographic divide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high quality is the key to whether the “China model” can be sustainable.

**Key words:** China model; sustainability; labor economics; demographic dividend

【编辑 高婉炯】